

金庸



与武侠小说研究

徐渊 ◎著

金庸



与武侠小说研究

徐  
渊  
◎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庸与武侠小说研究 / 徐渊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  
ISBN 978 - 7 - 5161 - 9745 - 5

I. ①金… II. ①徐… III. ①金庸—侠义小说—小说研究  
IV. ①I207. 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0724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无 介

责任印制 戴 宽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79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获陕西理工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省级特色学科、  
汉语言文学省级特色专业、“汉水文化”省级重点学科  
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 序 言

我对武侠小说的阅读，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当时正读大学，每年寒暑假回家，都会看到弟弟不知从哪里借来的一些武侠小说作品，闲来无事，就阅读一番。90 年代初，所在学校有两位教师在校内开了一个书屋，出租各类小说给学生看，其中，武侠小说摆满了几个书架。因与两位教师交好，书屋离宿舍也很近，所以在教学、工作之余，时常到书屋免费借阅武侠小说。书屋开的时间虽然不长，大概二三年时间，但我已将书屋的武侠小说作品基本看完。结婚初期，妻子当时还在邻县一个乡镇中学教书，有时工作忙，周末或假期回不来，我到她那里去时，尽管带有专业书籍，然而也时常会到镇上的出租书屋租武侠小说作品看，而且常常是一部全三册或全四册的作品，一两天就看完，因此甚至对所带专业书籍一页都未翻看，怎样带去再怎样带回。2001 年春节回家，偶然看到弟弟买的几本《今古传奇·武侠版》，于是，它们就又成了我的读物。弟弟喜欢买书，对武侠小说也情有独钟，《今古传奇·武侠版》几乎每期都买。也因此，在那几年里，每次回家，都能看到不断更新的《今古传奇·武侠版》，如果因为时间紧而没有看完，就干脆将其带走。十几年里断断续续的阅读，金庸、梁羽生、古龙、柳残阳、卧龙生、萧逸等新派武侠小说作家的作品看了很多，清代、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作品也有所涉猎，而在《今古传奇·武侠版》上，则阅读了小段、凤歌、步非烟、沧月等大陆新生代武侠小说作家的不少作品。所阅读的武侠小说虽然不少，但阅读最多、印象最深的还是金庸小说，很多作品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等都阅读过数遍，而且每次阅读都比较细致，并不是随手翻翻。



冯其庸在谈及阅读金庸小说的过程时描述说：“我每读金庸小说，只要一开卷，就无法释手，经常是上午上完了课，下午就开始读金庸的小说，往往到晚饭时，匆匆吃完，仍继续读，通宵达旦，直到第二天早晨吃早饭，才不得已暂停。如早饭后无事，则稍稍闭目偃卧一会，又继续读下去，直至终卷而止。”严家炎也说：“读金庸的许多作品，我们都有一种相同的经验：拿起来就放不下，总想一口气看完，有时简直到了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欲罢不能的地步。”回想我阅读金庸小说的过程，也是如此，只要开始阅读，手不释卷、通宵达旦就是常事。不过，尽管如此沉溺于金庸小说，然而，当时却没有考虑过要在学术层面对其进行研究，而仅仅是将其作为闲暇时的一种娱乐读物。如果说，学生时期因为缺乏学术意识和学术能力而使感性阅读没有上升到学术研究的层面是正常的，那么，工作之后闲暇时的继续阅读依然没有引起学术方面的思考，则未免显得不太正常。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比如，求学期间所了解、掌握并形成的文学观念是比较正统的，充分认可了所谓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的文学意义，而对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文学意义则缺乏认识，所以即使在金庸小说阅读上花费过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获得了比较强烈的感受和愉悦，却只是把阅读作为消遣、娱乐的过程，不能从文学意义上思考金庸小说，或者，即便对金庸小说的文学意义有所认识，但因为与已经形成的文学观念有违而不能加以正视；我当时并非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所在学校又地处秦巴山，信息比较闭塞，学术交流活动缺乏，所以对主要发生在 90 年代的大陆学术界掀起的“重写文学史”运动以及对金庸小说的经典化运动虽有所了解但缺乏广泛和深入的认识；我当时还比较年轻，学术研究尚处在摸索阶段，既缺乏学术经验也缺乏学术自信，更没有确立明确的研究方向，如此等等。

事情的改变发生在 2003 年。那一年，所在学校中文系让教师申报选修课程，而从金庸小说来说，大陆学界对其经典化过程至此时已基本完成，尽管争议仍然存在并且很大，但其文学史地位已基本确立。于是我就想，既然金庸已经被命名为中国 20 世纪文学史的经典作家，金庸小说已经被命名为中国 20 世纪文学史的经典作品，而我对金庸小说也曾有长期、多次的阅读，那么是否可以此申报选修课程，并由此开始，



在一定时间里，将金庸小说以及武侠小说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在慎重考虑之下，我最终以“金庸小说研究”为名申报了选修课程并获得批准。此课程名称虽与严家炎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名称相同，我在设计、组织教学内容时对严家炎根据讲稿整理而成的《金庸小说论稿》也多有参考，但具体讲授内容与之有较大差异。与此同时，我对金庸小说的学术研究也随之展开。当年，发表以金庸小说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1 篇，从那以后至 2014 年，我发表以金庸小说、武侠小说为研究内容或与“侠”有关的论文近 20 篇，平均每年近 2 篇。这些成果当然算不上丰硕，但对于曾经为阅读金庸小说而付出时间和精力的我而言，总算没有白读，多少也算是个交代。

2014 年底，一次与朋友聊天，谈及著书立说的话题时，朋友建议说，你可以把十几年金庸小说的研究成果整理一下，出一本专著。说实话，对这个问题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内心总是迟疑，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书”非常神圣，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出”的，虽然我在金庸小说研究方面付出了心血，也有收获，但总觉得研究还不充分、不深入，有很多问题尚需要更透彻、更精深的研究，贸然出书，未免显得浮躁。朋友的建议再次勾起我出书还是不出书的想法。思虑再三，我觉得朋友的建议还是可以采纳的：一方面，如果觉得此前的研究成果还存在某些不足，那么可以在整理过程中进行修正、补充；另一方面，此前的研究与后续进一步研究之间并不是矛盾关系，没有必要非得等到所有的问题都研究清楚之后再出书，后续研究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成果以文章或另书的形式出现，何况，在整理过程中还有可能发现新的问题。于是，从 2014 年底始，我在完成其他各项工作之余，便将身心投入了对书稿的整理之中。

原以为将已有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书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但真正开始整理之后发现，事情没有最初想象得那么简单。

首先是书的体例问题。金庸小说研究在港台主要始于 80 年代，在大陆主要始于 90 年代，尽管期间在金庸小说经典化问题上存在很大争议，但对金庸小说的很多方面如文学史地位、艺术成就、文化内涵、侠形象塑造、爱情描写、叙事艺术等都有了大量研究，而且有些方面已经



非常充分、深入。我在研究金庸小说时，一方面，有意识地避开了一些已有定论或达成共识的问题，或者对一些已有一定研究的问题从另外的角度进行分析，因而研究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另一方面，对出现在某一时期的或与金庸小说有关，或与金庸小说并无直接关联但与武侠小说或侠文化有关的热点问题也不乏思考，因此，所取得的成果并不全是针对金庸小说的研究，如此一来，在书的体例安排上就颇费周折。在认真梳理、分析已有成果之后，最终确定在整合章节内容时，能整合为一章的文章尽可能整合在一起；扩充之后能独立成章的单篇文章就安排为一章；不能整合进相关章节内而又不能或不宜作为单独一章，但又与本书内容相关的成果，将其作为“附录”出现；既不能与其他文章整合又不能独立成章，也不宜作为“附录”出现的，干脆舍弃不用。目前本书分为六章，其中，除第一章是由一篇文章扩充而成外，其余五章或者是由二三篇文章整合而成，或者是由四五篇文章整合而成。另有四篇文章因无法整合进相关章节，也无法独立成章，便选择其中一篇作为附录一，另外三篇文章舍而未用。附录二是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与第六章“武侠小说的文化生态”有关联，本想将其作为这一章的一个问题，但几经尝试仍然无法很好地与本章内容契合，则将其附录于书后，以求起到与该章内容相印证的作用。

其次是章节内容的论述问题。这其中主要涉及这样几个问题：其一，由几篇文章整合而成一章，并不是几篇文章的简单拼凑、叠加，而必须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二，将一篇文章作为独立一章，作为文章而存在的篇幅与作为一章而存在的篇幅相比，肯定是不够的，因而必须进行扩充；其三，现在的认识水平、资料掌握情况以及对问题思考的广度和深度与之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整理时会发现此前的成果中存在种种不足，必须对其进行修改；其四，以文章形式研究某一问题，即使有好几篇文章，也常常是就该问题的某些方面予以讨论，因而必然存有遗漏，将其作为本书中章节时必须予以补充而使其尽可能完整。因为这几个问题的存在，所以本书章节内容的具体安排与论述问题远比体例安排问题要复杂、困难得多，我因而投入了更多的心血。可以说，本书目前的六章内容，无论是由一篇文章扩充而成一章还是由多篇文章整合而成一章，都不是原来文章的简单复制、组合，变化是极



大的。当然，由于这些文章当初的完成情况不同，现在的变化情况也有所不同。例如第三章“金庸小说中的娱乐元素”，由《论金庸小说中的娱乐元素》和《金庸小说男主人公的成功元素》二篇文章整合而成，前者在发表时并不包含后者，在整合时，我不仅将后者按照前者的论述思路组合进去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且这一章除观点与原来文章基本一致外，其具体论述与原文已大相径庭，可以说是完全进行了重新论述。第四章“金庸小说中的华山”的完成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一些，因为整合形成这一章的五篇文章，是我2012—2014年才完成的陕西省教育厅科学项目“地域文化视阈下金庸小说中的陕西名山研究”的成果，加之这五篇文章本身就是按金庸小说中“华山”描写的五个方面分别探讨的，所以结构安排并不困难，对具体论述也可以不进行大的修改，但在增加资料运用的翔实性、减少资料运用的非重复性上也颇花了一番心思，而且，当初的研究并未涉及《笑傲江湖》这一金庸小说“华山”描写的内容，此次用1万余字的篇幅对其加以补充论述。其他各章完成情况多数基本与第三章相同，如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少数与第四章情况基本相同，如第一章。所以，整理成书的过程虽然不敢说是殚精竭虑，但至少也颇费了一番工夫。

与本书内容并非只是金庸小说研究因而缺乏系统性相一致，在书稿完成之后，书名的确定也令我颇感踌躇，并在“金庸小说研究”“金庸小说与武侠小说研究”“金庸小说与武侠文学研究”“金庸与武侠小说研究”几个名称间一再权衡。最终决定以“金庸与武侠小说研究”为书名，因为该名不仅可以涵盖金庸的人生经历、金庸对武侠小说的认识、金庸小说本身等本书所涉及的章节内容，而且可以包含“武侠小说的文化生态”一章的内容，相对于其他几个名称，应该更为准确、简洁、恰当一些。

无论怎样，用一年多的时间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对其加以调整、增删、改动、丰富并最终完成此书，我还是颇感欣喜并有几分成就感。

# 目 录

序言	(1)
<b>第一章 写作与金庸的自我拯救和实现</b>	(1)
一 写作与金庸的自我拯救	(2)
二 写作与金庸的自我实现	(7)
三 武侠小说的两次修订与金庸的自我实现	(16)
<b>第二章 金庸的武侠小说观</b>	(23)
一 金庸的武侠小说本体观	(24)
二 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观	(37)
三 金庸的武侠小说鉴赏观	(56)
<b>第三章 金庸小说中的娱乐元素</b>	(62)
一 引人入胜的情节	(62)
二 丰富多样的爱情	(71)
三 充满想象的武功	(81)
四 诙谐幽默的趣味	(91)
五 走向成功的人生	(101)
<b>第四章 金庸小说中的华山</b>	(109)
一 华山地理	(110)
二 华山派	(121)
三 华山人物	(127)



四 华山武功 .....	(136)
五 华山论剑 .....	(147)
六 笑傲江湖 .....	(157)
<b>第五章 金庸小说的影视化 .....</b>	<b>(172)</b>
一 金庸小说影视化的原因 .....	(173)
二 毁多誉少的金庸影视剧 .....	(186)
三 金庸小说影视改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207)
<b>第六章 武侠小说的文化生态 .....</b>	<b>(219)</b>
一 武侠小说的文化正生态 .....	(220)
二 武侠小说的文化负生态 .....	(237)
<b>附录一 走向创新的模仿：《雪山飞狐》与《罗生门》之比较 .....</b>	<b>(258)</b>
<b>附录二 当代大学生的金庸小说阅读情况与侠义精神 ——关于“金庸小说与侠义精神”调查的分析报告 .....</b>	<b>(265)</b>
<b>参考文献 .....</b>	<b>(275)</b>
<b>后记 .....</b>	<b>(277)</b>

## 第一章

### 写作与金庸的自我拯救和实现

金庸的人生无疑是成功的人生。凭借所创作的武侠小说，拥有不分地域、跨越时空、超越政见的数以亿计的读者，从而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获得重要的一席之地；凭借所撰写的社论而被冠以“香港第一健笔”的美誉，并将麾下的《明报》办成香港的言论重镇，从而成为香港最杰出的报人之一，这些都足以证明金庸的成功。而无论是作为武侠小说作家还是作为报人，金庸赖以成功的利器就是写作。这不仅是因为如果没有写作就没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社论本身，而且是因为如果没有写作金庸的人生一定是另一种轨迹。

关于金庸的人生，金庸本人并无自传描述，而且也无写自传的打算。他自谦地认为：“金庸为人所注意只是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人，并无多大价值……写自传似乎没有资格。而且我这辈子和太多的人交往，有太多的秘密，也不方便公开。”<sup>①</sup> 但为金庸立传的书籍却屡有出现，如冷夏的《文坛侠圣：金庸传》、冷夏与辛磊合著的《金庸传》、傅国涌的《金庸传》、张建智的《儒侠金庸传》等，此外，还有一些虽非为金庸立传，但或是在某些章节里介绍了金庸的生平，或是收录了一些金庸亲朋的回忆性文章以及金庸访谈录的书籍，如孔庆东的《金庸评传》、费勇与钟晓毅的《金庸传奇》、葛涛的《金庸其人》《金庸评说五十年》等。对于他人为自己所立之传，金庸并不认可。他说：“所有的《金庸传》，最近出的（还没有详细看过）和以前出版的，都没有经过我的授权，傅国涌先生和香港的冷夏先生，我几乎可以说不认识。我这

<sup>①</sup> 张英：《学问不够是我的一大缺陷》，《南方周末》2003 年 7 月 31 日第 C21 版。本文是《南方周末》记者张英在杭州对金庸的采访实录。



一生经历极其复杂，做过的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sup>①</sup> 尽管如此，根据上述书中关于金庸生平的共同描述，以及金庸亲朋的回忆文章，特别是金庸本人在访谈中的一些自我表述，也许金庸人生中的隐秘之事未曾得以真实地揭示，但金庸的基本人生轨迹却是比较清晰可见的，从中不难看出写作之于金庸的重要。写作不仅使金庸一次次地拯救了自我，也使其一步步地实现了自我。写作之于金庸的自我拯救，主要表现于金庸通过写作不断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特别是在遭遇挫折或面临困厄之时，是写作帮助他渡过难关，改变命运；写作之于金庸的自我实现，则主要表现于金庸通过写作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个性愿望、理想追求、人生感受与认识等，并最终实现人生价值。

## 一 写作与金庸的自我拯救

金庸的写作能力，在青少年时期就已显露端倪。据他当年就读浙江省立联合高中时的同学回忆，“他是学校的高材生，数理化成绩优异，英语、国文更是出色，能写得一手好文章。”<sup>②</sup> 金庸在衢州中学上学时的同学也回忆说：“每次语文作文课他都是当堂第一个交卷，获得最佳评分，作文发下来，大家争相传阅。”<sup>③</sup> 也就是在衢州中学读书期间，金庸在当时的上海《东南日报》副刊“笔垒”头条以“查理”为笔名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他的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此文是因金庸的一位同学被学校训育主任训斥说“你真是狂得可以”而起，金庸以此为事由，用王国维诗句“一事能狂便少年”为题，对“狂”进行剖析，肯定“狂”的价值，明确表达了“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的观点。文章虽然简短，但其流露的才气、展示的才华却颇得“笔垒”主编陈向平的欣赏，甚至“不久，他从金华到邻近

① 张英：《学问不够是我的一大缺陷》，《南方周末》2003年7月31日第C21版。

② 叶炳炎：《查良镛在联合高中》，见葛涛《金庸评说五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③ 王浩然：《难忘金庸在衢州中学的日子——“三驾马车”的友谊》，见葛涛《金庸评说五十年》，第22页。



的衢州出差，专门到石梁乡下来看望这位作者，他没有想到此文竟出自一位十六七岁的高二学生之手。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是投机，成了忘年交”<sup>①</sup>。此后不久，金庸的第二篇文章《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有感》又在“笔垒”上发表。文章批评李清照《人比黄花瘦》的自我怜惜和使人萎靡不振的效果，并借由对李清照的批评，“对现代一切吟风弄月，缺乏战斗精神的思想提出抗议，我控诉那种自我怜惜的心理”，最后发出“坚强地忍受吧，我们不要怨叹与诉苦”的呼声。此文发表于1941年12月7日，对李清照的批评虽然不失偏颇和牵强，但在抗战的大背景下，金庸能进行如此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思考，体现了少年金庸的不平凡。后来，金庸长达6000余字的谈论友谊观的文章《千人中之一人》又分五期在“笔垒”上连载。金庸少年时期在上海《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所发表的这几篇文章，不仅显示了金庸的写作才华，而且更重要的是，当金庸在1944年于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求学，因不满当时横行于校园中的一些学生特务，出于正义感而向校方投诉，却被勒令退学以后，正是通过写作而结识的陈向平将他“推荐到杭州《东南日报》社长汪远涵处”<sup>②</sup>，主要工作是做记者兼收录英语的国际新闻广播。在此期间，金庸也写过一些文章。金庸在《东南日报》工作将近一年时间，虽然不长，但这一段经历却使他受益匪浅。1947年，上海《大公报》招人，金庸报考。“这场考试很难，录取比例为1000:1，在这个比例中金庸脱颖而出，因为他的文笔非常好，英语也非常好。”<sup>③</sup>而据金庸自己说：“因为有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所以1947年上海《大公报》招考国际新闻的电讯翻译员时，我去投考，成绩相当不错而得录取。《大公报》于1948年在香港复刊，我被派来香港。”<sup>④</sup>从上述简略的金庸去往香港之前的经历不难看出写作对于金庸的意义。没有写作，金庸就不会认识陈向平，更不会得到陈向平的赏识；没有陈向平的赏识，金庸就不会在遭遇人生困

<sup>①</sup> 傅国涌：《“一事能狂便少年”：少年金庸的几篇旧文》，见葛涛《金庸评说五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这里有关金庸几篇文章的引用均出于此。

<sup>②</sup> 陈淑媛：《掀起历史的一角看金庸》，见葛涛《金庸评说五十年》，第71页。

<sup>③</sup> 孔庆东：《金庸评传》，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sup>④</sup> 《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节选），见葛涛《金庸评说五十年》，第13页。



窘之时被推荐进入《东南日报》，从而受到新闻方面的专业训练，并强化写作和英语水平；没有新闻方面的专业训练和良好的写作与英语水平，金庸也就不能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招聘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大公报》的一员，并前往香港，而且在其一生之中与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金庸 1948 年到香港，自称是“身无半文走香江”“南来自手少年行”。1952 年，金庸到《大公报》另创副刊《新晚报》做编辑，主要撰写影评文章。在此，金庸结识了陈文统即后来的梁羽生，二人常在一起谈武论剑，交流阅读武侠小说的心得。1954 年，香港两个武术派别即“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和“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在澳门设擂比武，虽然整个比武过程很简单，但此事一时成为大街小巷热议的话题。具有商业头脑的《新晚报》总编辑罗孚看到了商机，欲借武侠小说扩大报纸的影响，他先找在他看来更有才华的陈文统，陈文统在万般推脱不果后，以“梁羽生”为笔名创作《龙虎斗京华》在《新晚报》连载，并迅速走红，掀起香港武侠小说热。香港掀起的武侠小说热让罗孚感到仅凭梁羽生一人是不够的，于是又找金庸。金庸先是推辞，但终究敌不过罗孚的游说，1955 年开始创作《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连载，并拆解自己名字“查良镛”中的“镛”字为笔名。《书剑恩仇录》获得巨大成功，“在《新晚报》连载的时候，顿时就使《新晚报》洛阳纸贵。人们形容当时的情况为：‘家家说书剑，户户论金庸。’一部书就使金庸走红，而且小说迅速传到南洋一带，被改编成其他形式，用来说书、广播。所以金庸和梁羽生就成了一时瑜亮，金庸从此也就‘扬威武林’。”<sup>①</sup> 金庸承认，“在写《书剑恩仇录》之前，我的确从未写过任何小说，短篇的也没有写过”<sup>②</sup>，而一写就是长篇并获得成功，的确有些匪夷所思。但这不是偶然的。之所以能如此，首先是因为读书。金庸说：“年轻时培养我创作能力和写作能力最

<sup>①</sup> 孔庆东：《金庸评传》，重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5 页。

<sup>②</sup> 林以亮、王敬羲、陆离：《金庸访问记》，见费勇、钟晓毅《金庸传奇》，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1 页。金庸在本次访谈中所说和后来与严家炎问答时所说并不相同。在回答严家炎的提问时，金庸说：“我在重庆时曾经写过短篇小说，题为《白象之恋》，参加重庆市政府的征文比赛，获得过二等奖，署的是真名。题材是泰国华侨的生活，采用新文学的形式。”（见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77 页）

主要的因素是读书，特别是阅读小说。”<sup>①</sup> 不仅他家藏书颇丰的“书房里的书他大都‘翻’过”<sup>②</sup>，而且，他所求学的小学、中学的图书馆，包括他在重庆被勒令退学后所一度就职的中央图书馆，都是他读书的绝佳场所。而在阅读的小说中，除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外，金庸尤其喜欢看武侠小说，“我自小在小学中学就一直租武侠小说看，买来看，一直就喜欢，古代的武侠小说差不多全看过了”<sup>③</sup>。广泛的阅读不仅使金庸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积淀了深厚的文学修养，培养了良好的写作能力并在其少年时所写的文章中充分显露出来，而且，对武侠小说的大量阅读也为其日后写作武侠小说奠定了知识、文体、技巧、方法等方面坚实的基础。所以，对于其武侠小说写作，金庸的回答是：“我不过是一个爱听故事的人，走到前台，自己也说起故事来。”<sup>④</sup> 其次是因为想象力。金庸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他的兄弟在回忆中描述说：“每天晚上，小阿哥都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都是现编现讲，可编得天衣无缝，讲得引人入胜，常常是讲到兴头上，一下子跳起来站在床上，连比画带模仿，手舞足蹈的，有意思极了。”<sup>⑤</sup> 金庸对自己的想象力也颇为自诩，他说：“文学的想象力是天赋的，故事的组织力也是天赋的……我可以把平淡无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许多幻想说成一件大奇事。”<sup>⑥</sup> 可见，在想象力方面金庸的天赋极好。而对于文学作品特别是武侠小说的广泛阅读，使金庸的想象力无疑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对于传奇性、故事性极强的武侠小说而言，金庸丰富的想象力无疑是非常关键的创作条件。最后是因为编辑工作本身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写作能力，并扩大了知识结构。无论是在《东南日报》《大公报》还是在《新晚报》工作期间，金庸都写过文章，特别是在《新晚报》工作期间，金庸写过散文，更写过大量影评文章，而且“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艺术

<sup>①</sup> 《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节选），见葛涛《金庸评说五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sup>②</sup> 宾语、潘泽平：《我的哥哥金庸》，见葛涛《金庸评说五十年》，第28页。

<sup>③</sup> 黄里仁、王力行、陈雨航：《掩映多姿，跌宕风流的金庸世界》，见费勇、钟晓毅《金庸传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

<sup>④</sup> 同上。

<sup>⑤</sup> 宾语、潘泽平：《我的哥哥金庸》，见葛涛《金庸评说五十年》，第27页。

<sup>⑥</sup> 《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节选），见葛涛《金庸评说五十年》，第6—7页。



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已超过了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sup>①</sup>。不仅如此，在《新晚报》时，金庸即以“林欢”为笔名创作过电影剧本，如《绝代佳人》《兰花花》等。这不仅更加强化了金庸的写作能力，而且为金庸日后在写作武侠小说时于有意和无意之间娴熟运用影视剧技巧作了充分的准备。因此，金庸写武侠小说且出手就是长篇看似偶然和匪夷所思，实则在情理之中。更为关键的是，正是因为金庸在语言文字、写作技巧、文学修养、知识储备、想象力诸多方面具备了写作武侠小说的条件，所以才能在香港呈现出武侠小说需求热和写作热时，进行武侠小说的写作。否则，这样的契机是抓不住的。是写作让金庸因武侠小说而进入广泛人群的视野，并为他带来声名和利益。之后，《碧血剑》《雪山飞狐》接连问世，至百万字巨著《射雕英雄传》的出现，金庸武侠小说大宗师的地位即告确立而无人能够与之比肩。从一个普通编辑转变为广受瞩目的武侠小说大宗师，写作让金庸又一次完成了自我拯救。

1959年，主要凭借写作武侠小说的稿酬和版税，金庸自立门户，与人合资创办《明报》。金庸的这一选择是比较冒险的。因为香港媒体非常发达，各种报纸几乎已将市场瓜分殆尽，而金庸既无深厚的政治背景做依靠，也无雄厚的资金做支撑。也因此，《明报》的起步举步维艰，不仅最初只是一份四开小报，而且没有固定和较大的报馆。《明报》所以能坚持而不倒闭，并最终跻身于大报行列，成为香港言论的重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连载金庸新写作的武侠小说作品。《明报》在创刊之始，金庸的第五部小说《神雕侠侣》即在其上连载；之后，《倚天屠龙记》《白马啸西风》《天龙八部》等作品陆续连载。对《明报》度过艰难的萌芽期以及之后的稳定发展而言，这些小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二是金庸针对时事而写的社评。金庸在写小说的同时，每天还要写一篇社评，通常是白天写小说，晚上写社评。评论对象多是发生于当时的事关政治、经济、文化、民生

<sup>①</sup> 《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节选），见葛涛《金庸评说五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